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美经济关系

Geoffrey Garrett

一 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美关系已造成了三方面的深远影响。首先，欧洲和日本正处于比美国更艰难的时期，而印度的发展至少落后中国 15 年，因此中国和美国便成了事实上的“两国集团”（*de facto* G2），而这几乎是自发形成的。其次，中国追赶美国的步伐正在加快。至 21 世纪 20 年代中期，尽管那时中国仍然不如美国富有与强大，但预计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再次，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美两国分别与世界其他各国之间的经济失衡已得到了缓解，但并不如一些人预测的那般，金融危机也能缓解两国之间的巨大经济失衡。

因此，亚太世纪的前半叶将由一个逐渐上升的中国与逐渐衰退的美国主导。这两个国家在价值观与利益上都有着巨大的不同，却又处于一种严重失衡但紧密依存的经济关系中，它们将并肩站在世界各国的前列。中美两国的举动——单独的、合作的、在区域与多边论坛上的、相互冲突的——将越来越多地规范各种全新可能性的全球影响范围。这些可能性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和安全方面，还包括许多新的挑战，如来自可持续性方面的挑战。

什么是中美关系的可能方向：地缘政治冲突，经济竞争，还是紧张共存？针对中美关系的激烈争论，权威专家认为，建立在经济依存上的紧张共存似乎是最可能的结果。

今日的中美关系与 20 世纪后半叶的美苏关系之间有一个清晰的相同点

和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中美两国的核心原则与世界观之间可能存在持久分歧，这必将使另一场紧张而长久的地缘政治上的对抗成为可能。不同点则在于，中国已深深融入世界经济并与美国经济息息相关，而苏联当时并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它与美国的经济联系几乎不存在。如今聪明的投资者称，在 20 世纪后半叶，相比于政治上的相似，与“冷战”时期不同的经济差异更为重要。

悠久的历史表明中美经济的融合将成为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强大动力。从康德（Kant）和科布登（Cobden）^① 开始，自由主义者就相信经济纠葛降低了武装冲突发生的概率。这是“二战”后美国开放型经济观念的指导原则，尽管这并不包括共产主义世界。比尔·克林顿和老布什似乎也相信经济纠葛在地缘政治上的力量，在苏联解体后，他们坚决支持中国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

然而，许多人如今认为中美经济关系严重失衡，不仅无法起到抑制地缘政治冲突的作用，甚至将成为世界两大巨头冲突的源头。这便是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2009）说我们如今仿佛生活在“一战”刚结束的岁月的原因。

迄今为止，中美经济关系中持续发生的碰撞与矛盾激化更像是释放压力的阀门，而不是时刻威胁着即将逃离掌控的大火——最坏的情况便是引发另一场世界大战。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经过 20 多年对两国矛盾重重的关系进行精明管理之后，因为其中巨大的利害关系，两国首脑仍将继续对双方的摩擦进行控制。

不可否认，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美关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这些挑战会因为冲突的潜在代价而减少。正如亨利·基辛格（2011）指出，中美关系永远不可能发展成为第二次“冷战”，因为，“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凌驾于另一个之上，而且两国之间的冲突将使它们的社会疲惫不堪”。中美关系的巨大利害关系——两国经济纽带的优势以及武装冲突的负面效应——应使我们相信，中美两国能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① 理查德·科布登（Cobden, Richard）（1804 ~ 1865 年），英国政治家。他被称为“自由贸易之使徒”（Apostle of Free Trade），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推动者（译者注）。

本文的剩余部分如下：下一部分将描述中美在金融危机前后的经济轨迹，介绍中国大规模抵御危机措施的成功之处，以及表现不佳的美国与其同样有效的财政与货币刺激政策。第三部分将对两国持久的经济失衡进行分析。即使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中美两国都开始缓解各自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失衡，两国之间的经济失衡仍然存在。第四部分强调这些经济失衡对两国经济关系而言，并不如通常认为的那样重要，因为它们掩盖了两国私营成分的紧密依赖性。最后一部分回顾了中美双方在处理经济紧张关系时的历史，尤其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这些历史让我们相信，在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稳定而不是冲突，将继续成为两国关系的主题词。

二 自发而成的“中美两国集团”

由于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监管体系，全球金融危机孕育而生。在亚洲各国无封顶的信贷支持下，美国的次贷危机愈演愈烈，迅速通过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一体化扩散至欧洲，随后由于世界贸易大幅缩水而席卷全球。后金融危机时代，自由、充满冒险精神的资本主义失去了它的光辉，债务和赤字困扰着西方世界，新兴经济体正在反思其对出口的依赖以及是否为西方各国债务提供资助。

但万变不离其宗。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基本发展轨迹与之前是一致的——始终朝着一个由世界最强的美国，和新兴国家中最大、发展最迅猛的中国相互影响、共同主导的世界前行。虽然不论中国还是美国都不会为双方关系扣上这样一个宏大的名目，但这个事实上的两国争霸集团已在形成过程中，而且这个过程几乎是自发完成的。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复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实体经济表现良好，美国的 GDP 已从 2008 年第四季度的急剧下降，最低 -6% 的低谷，回升至历史常态，达到 3% 左右（见图 1）。同样的，股票市场也重新获得了它在金融危机时期损失的大部分市场价值（见图 2）。事实上，这两部分的恢复，尤其是 GDP 的回升，都展现了美国在大萧条之后经济复苏所表现出的基本 V 型曲线。

然而，美国的复苏在两个最突出的政治经济数据上却表现得不尽如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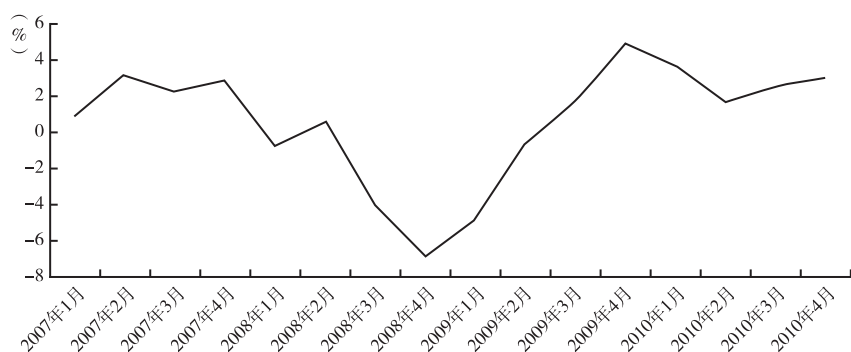


图 1 美国 GDP 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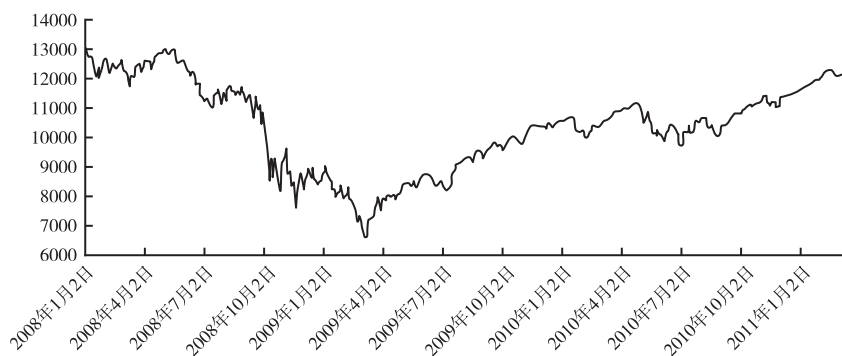


图 2 美国证券市场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资料来源：道琼斯公司。

意：失业率和房价。华尔街可能已辉煌如旧，但缅因街^①仍踽踽前行。在 2008 年初至 2009 年底这段时间内，失业率已翻倍上升至 10%，随后缓慢下降，但最终仅降至比 9% 略低（见图 3）。而在 2000 年至 2006 年翻了一番之后，美国的房价在随后的两年半中下降了 30%，之后房价基本持平（见图 4）。

解读这些数据的方法至少有两种。乐观人士认为房价和失业率总是美国经济复苏的滞后指标，它们很快就会回升——即使不以任何接近 V 型曲线

① 缅因街：泛指小企业、小作坊和平民百姓，也指平民阶层及他们的生活（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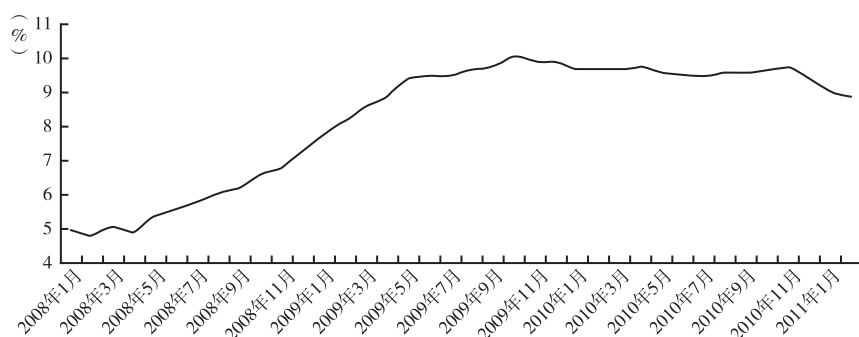


图3 美国失业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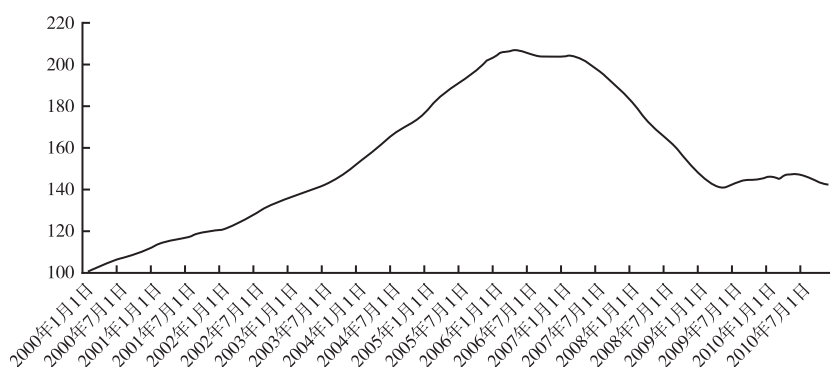


图4 美国房价（Case Shiller 房价指数）

资料来源：标准普尔 Case Shiller 房价指数（20 个城市）。

方式的回升。悲观主义者则称失业率和房价走向更倾向于 L 型曲线，最近的糟糕形势仍将在长时间中持续。然而事实则可能在两者中的某处。

对于未来美国经济而言，后金融危机时代不断上涨的债务和赤字更令人担忧（见图 5）。金融危机时期，美国通过了大量财政刺激政策，但这些政策也导致 2009 ~ 2010 财政年度的预算赤字超过 10%。美国福利制度正处在人口老龄化定时炸弹和“二战”后婴儿潮的围困之中，但是短期刺激政策仅仅增加了福利制度两大组成部分——保障退休人员生活的社养老金和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的财政不可持续性。

奥巴马政府的预算规划在 2014 削减年度赤字至 4%（根据独立国会预算办公室），并使其在 2020 年末回升至 5% 以上。如之前的几任总统一样，奥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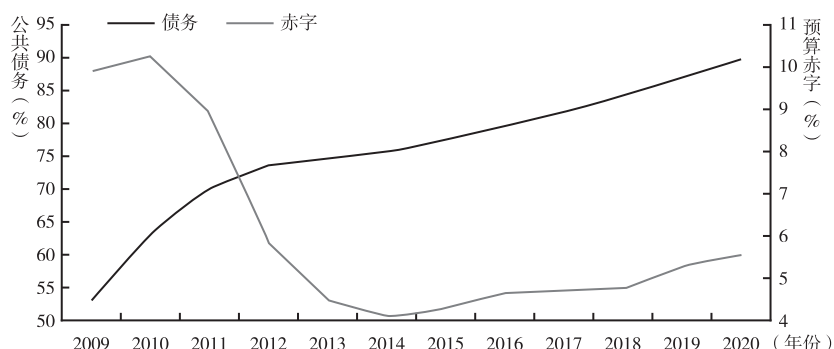


图5 美国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GDP）（2009~2020）

资料来源：国会预算办公室对奥巴马2011年预算的估计。

马不愿意相信，对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但行使投票权的公众仍坚定地站在不作为的立场上。然而，金融危机时期的大量补救措施以及福利制度上的无所突破，使得美国公共债务预期将翻倍，从2009年的仅超过GDP的50%，到2020年将增加到GDP的90%。

从全球金融市场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美国的财政未来。在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后三个阶段，金融市场都认为对美国而言阻力最小的道路是扩大其财政赤字，长达10年之久的美元贬值便是其表现。从2000年到2002年，美元贸易加权指数实际是上涨的——首先是千年（Y2K）问题并没有实现，然后是“9·11”恐怖袭击之后的航空领域依旧安全（见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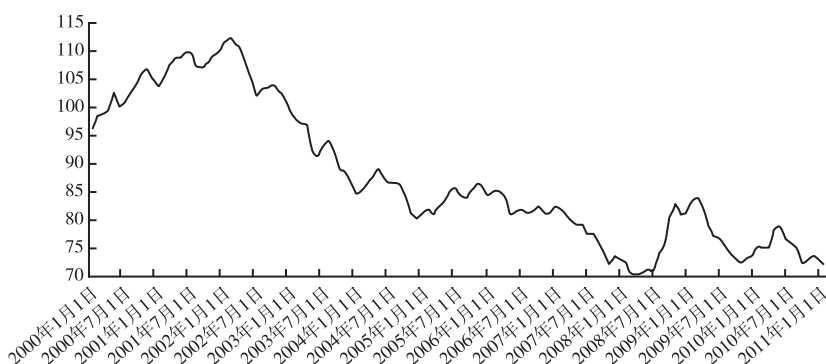


图6 贸易加权美元指数

资料来源：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然而在随后的 6 年中，美元贬值达 30%。在金融危机时期，美元一度短暂回升——可能因为资产被遣返回美国，也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的事实。但是从那时起，美元似乎又进入了长期下跌期，如今的美元仅是其 10 年前价值的 2/3。

总而言之，美国的经济状况非常复杂。GDP 在金融危机的低谷之后已有所回升，公司资产负债表上有数万亿美元等着寻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但是美国的财政问题确实存在，有人担心，过去曾一度挽救美国于债务危机中的创新精神以及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将不再行之有效。然而，就此预测美国经济将很快从世界经济悬崖上跌落也过于鲁莽。由于亚洲逐渐崛起以及美国渐渐放缓其发展脚步，长时间内更为可能的情况将是美国经济呈现相对下滑趋势。但结合美国的军事霸权以及其文化政治影响力仍比其他国家更显著的事实，马克·吐温的说法似乎十分贴切：谈论美国的终结便是过分夸大。

显而易见，中国经济的轨迹大不相同。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连续 30 多年平均两位数的增长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奇迹。当然，中国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如大规模城市化、内部发展、环境污染、能源安全、快速老龄化以及必将寻求政治变革的大量中产阶级。然而，中国强盛的国力一次次证明，人民对追求美好生活源源不断的动力以及他们与生俱来的商业触觉是一对足够强大的组合，足以成功应对这些挑战。

许多人担心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将终结中国神话。中国长期依赖“出口带动经济增长”这柄利剑，而当金融危机时期全球贸易大幅紧缩时，这把剑也悬在了中国的头顶。但是史书告诉我们，全球金融危机并不是中国神话的丧钟。事实上，中国能成功避开世界贸易不景气带来的潜在灾难性影响，便是这场充满奇迹的危机中令人惊叹的表现之一。

2007 年初，中国经济涨幅达到了令人兴奋的 13%，但这个数字毫无疑问是不稳定的。随着 2008 年全球经济开始面临真正压力，中国经济涨势陡然下滑，2009 年第一季度的涨幅仅略超过 6%（见图 7）。但短短 12 个月之后，涨幅又回到了 12%，随后稳定在 10%。

中国并不对世界贸易崩盘免疫，但其影响在中国却被稀释了：2008 至 2009 年，世界经济整体下滑 30%，而中国仅下降了 15%（见图 8）。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影响仅持续了 12 个月，2010 年中国的贸易水平又回到了快速增长的轨迹上，与 21 世纪初期水平持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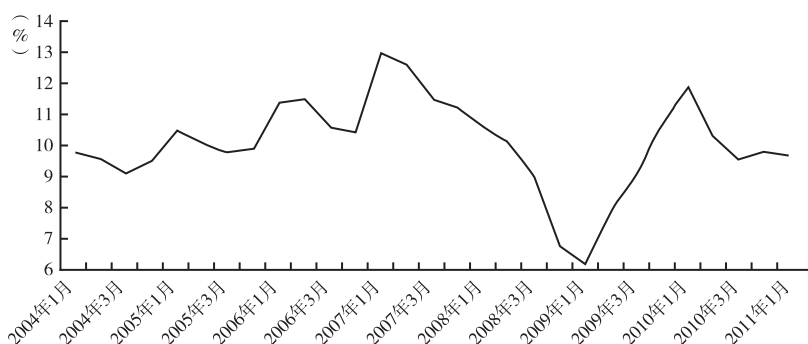


图 7 中国 GDP 增长率

资料来源：贸易经济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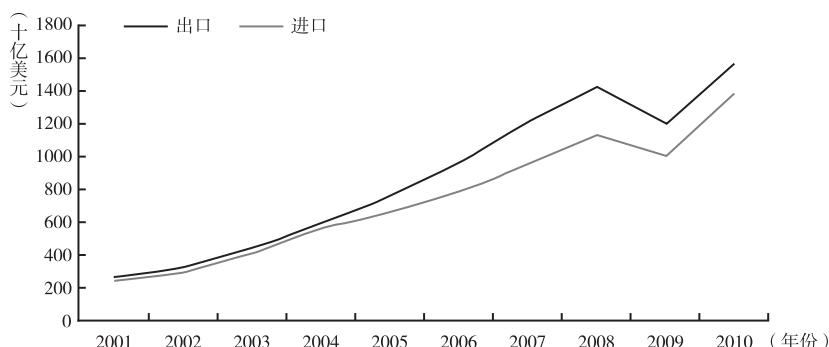


图 8 中国贸易额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成功抵御危机的秘诀在于大量财政刺激政策的连环出击以及银行借贷的急剧增加。2009 年是不断抵御危机的一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该年度的最佳预测，相比于美国的财政刺激政策，中国自主决定的财政刺激政策在 GDP 中占更大比重：中国的财政刺激投入将占 GDP 的 5.8%，而美国仅占其 GDP 的 3.8%（IMF，2009）。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中国并没有一家银行已破产或面临破产，中国仍向其金融体系投入了和美国几乎一样多的财力（占各自 GDP 的 21%）。如果将这两个数字相加以衡量该国为抵御全球金融危机所作的努力（相对其经济规模），在主要的 20 国集团中，中国排名第三，仅次于饱受金融危机摧残的日本和英国，高于金融危机的中

心——美国。

在金融危机浪潮中，中国主要的经济挑战是通货膨胀（见图 9），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从 2002 年至 2008 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从零上涨至 6%，而由于此次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2009 年的通胀率回落至零。当所有的钱都流入中国经济体系时，一个负面影响也随之而来：中国的通胀率很快回升——2010 年已超过 3%，预计在 2011 年达到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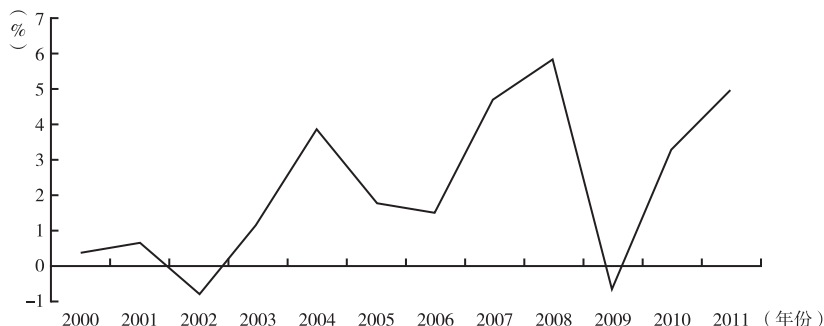


图 9 中国通货膨胀率（占消费者价格指数比例）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尽管如此，中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最好总结，便是这个国家出色地完成了 1978 年后中国经济神话面临的巨大挑战。并且这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国内政策的调度，而不是来自于国际社会的帮助。

因此，中国仍在兴奋地攀登世界经济排名的阶梯。2010 年，按市场汇率计算 GDP，在总体经济规模上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最佳结果便是中国最终将在 21 世纪 20 年代中期取代美国的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预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 2016 年的 GDP，中国便会超越美国（IMF，2011）。高盛集团目前尚不愿意预测何时美国将沦为第三大经济体或美国是否会滑落至第三位；但大致可以预计，美国将被印度超越，尽管这种情况在 21 世纪后半叶才有可能出现。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与美国显然已成为了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两国之间的差距也已缩小。中美关系的全球影响早已十分深远，如今这种影响比以往更为巨大。

三 中美经济失衡

将所知的全球金融危机经济现象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发现世界确实朝着两国争霸的局面前进，而且这几乎是自发形成的。中美经济关系非常重要，但它也严重失衡。

目前，金融危机之前用来衡量中美关系的两个关键指标的整体统计结果已众所周知：中国政府购买的美国国债（国库券）量快速增长；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大量消费。2000~2008年，中国对美国政府购买的美国国债的持有量增加了5倍多，2008年的持有量超过了5000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同期增加了2倍多，在2008年超过了2500亿美元（见图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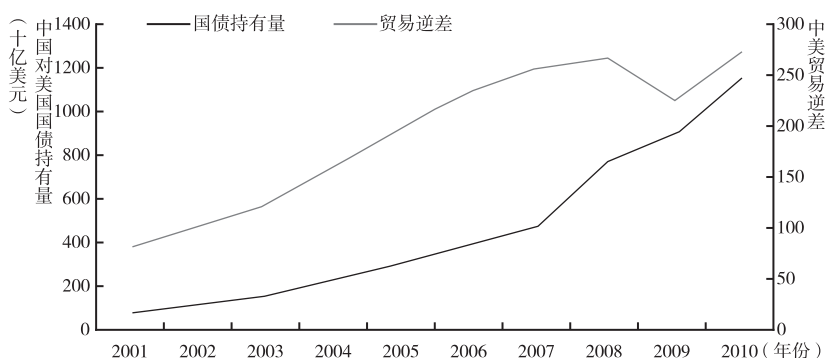


图10 中美贸易逆差及中国对美国国债持有量

资料来源：美国贸易统计，美国联邦储备局。

同时，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失衡中固有的相互依赖性。通过买入美元以及以美元计价的证券、保持美国的低利率以及美国债务融资消费的繁荣，中国使其货币相对美元迅速升值。这虽然让中国制造的商品从美国货架上纷纷下架，但也使中国多年来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成为可能。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不断谴责这些失衡，并将其描述为“不可持久的”。然而，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不论中国还是美国都不想阻止这场狂欢，而音乐仍在飞扬——两国经济都从这些失衡中获益不少，至少在短期内确是如此。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乐声戛然而止。著名评论员，如《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2008）指出，中美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背后主

要的偶然因素之一。

然而，金融危机也带来一线希望：通过迫使中国更多地依赖国内经济增长而不是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以及通过抑制美国消费者的旺盛食欲，金融危机将自然地缓解中美经济失衡。多消费、少节流、少投资，中国表现得越来越美国化；少消费、多节流、多投资，美国表现得愈发接近中国。美国对中国的进口量将缩水，而出口量将有所增加。中国购入的美元以及美国国债量将减少，人民币对美元将有所升值。中美经济失衡将从不稳定的依存共生向更加平衡与稳定的相互依赖发展。

初步证据表明，这样美好的愿景或许已走到了尽头。特别是在 2009 年，美中贸易逆差 10 年来首次下滑，降幅超过了 400 亿美元。尽管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长期可行性令人十分担忧，但中国政府仍在 2009 年增持美国国债，并超越日本成为了美国政府最大的海外债主。

随后到 2010 年，中美经济失衡能够快速大幅缓解的幻想伴随着一声重击回到了现实中。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逆差增长超过 500 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国债持有量增长也超过了 1000 亿美元。如今，中美经济比以往更加庞大、愈发失衡。

双边失调反映的关键问题是，经济失衡的轨迹是否折射了中美两国各自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或它们是否是从这些关系出发的？也就是说，对于中美关系是否有不同的解读，或这是否是这两国各自经济更为宽广的发展轨迹的双边展现？如果后两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关注中美经济失衡的理由便少了，从本质上而言，显然应更关注两国各自的国民经济。

然而证据却是不统一的，数据也能支持中美经济关系必然存在奇特之处这一解读。

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即不包括中国）在 2006 年达到峰值 6000 亿美元——几乎是同年美中贸易逆差的 3 倍（见图 11）。2009 年，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减少了一半，然而它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仍在 2006 年的水平浮动。最终，在 2009 年，美中贸易逆差达到了 2660 亿美元，仅比同年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总和少 500 亿美元。

换言之，2009 年，美中贸易逆差占美国对世界各国贸易逆差总和的 50%。2010 年，随着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其贸易逆差上涨超过 1500 亿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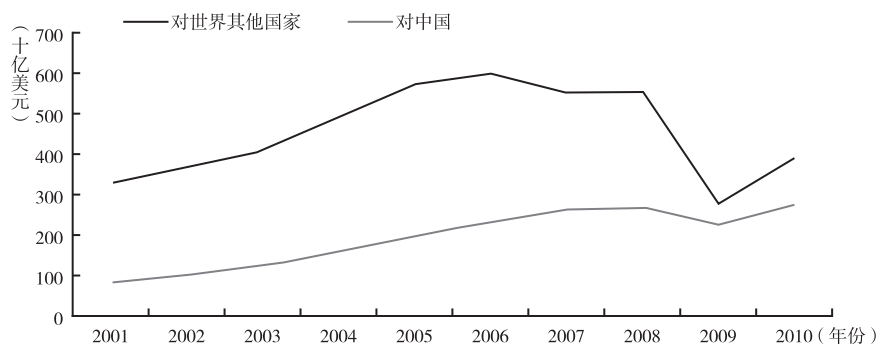


图 11 美国贸易逆差 (2000 ~ 2010)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对外贸易）。

元。尽管这些涨幅的 2/3 来源于中国之外的国家，但美中双边贸易逆差仍是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贸易逆差的 3/4。

在中国的贸易数据中，美国也显得很独特（见图 12）。除美国外，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仅出现在 2001 年至 2006 年，以及 2009 年至 2010 年。2010 年，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是 900 亿美元——相比 2001 年的 610 亿美元有所上涨。从这 10 年来看，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基本保持相对少量的贸易逆差——这与中国是一个不断积累更多贸易顺差的国家的普遍认知相去甚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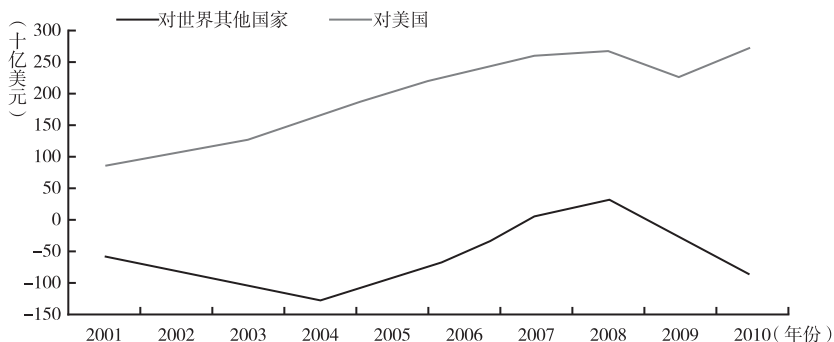


图 12 中国贸易顺差 (2001 ~ 2010)

资料来源：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然而在同一时期，中国对美国始终保持顺差状态——从 2001 年的 830 亿美元到 2010 年的 2730 亿美元，贸易顺差量增加了 2 倍多。只有当美国被

计算在内时，才能在数据中得出中国是一个贸易顺差大国的传统结论。

在过去 10 年中，美国国债的海外持有量增加了 3 倍多，几乎达到了 4.5 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 GDP 的 30%（见图 13）。2001 年，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量为 780 亿美元，不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持有量的 1/10。而到 2007 年，中国的持有量已直线增长至 5000 亿美元，大约是世界其他国家持有量总和的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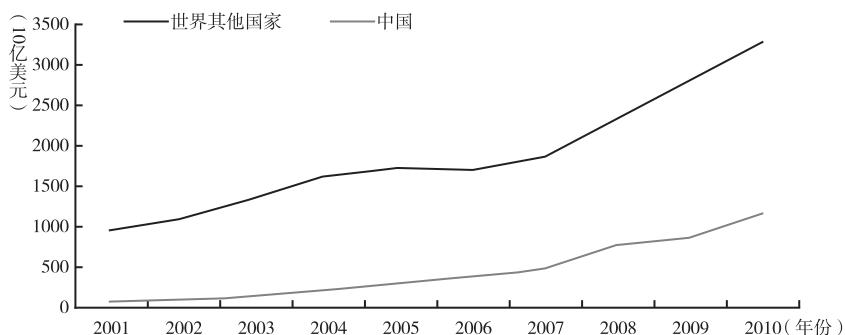


图 13 美国国债的海外持有量（2001 ~ 2010）

资料来源：美国财政部。

由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在其摇摇欲坠的国内经济中投入了接近 2 万亿美元，美国国债的海外持有量直线飞涨。尽管其利率接近零，并且美元在全球市场上遭遇“围攻”，但世界各国仍愿意购买美国国债，因而，持有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2007 ~ 2010 年间，中国的持有量增加了一倍有余，在 2010 年底达到了 1.16 万亿美元。同时，此 3 年间其他国家的持有量总和增加了 75% 至 3.3 万亿美元。目前，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占有所有海外持有量的 1/4 强——这个数字小于媒体炒作的数量，但由于美国与其最大的海外债主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这一数量仍是十分庞大的。而现在，中国便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国。

将图 11 ~ 图 13 的数据综合分析，我们便能得出三方面内容。第一，与人们所知的一致，美国对世界各国都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并向它们借款无数。第二，中国的总体贸易地位可能比人们认为的更平衡。但是，第三，在过去 10 年中，不论就绝对数字，还是相比于两国各自与世界其他国家的

关系而言，中美经济失衡已愈发严重。中美经济关系的规模及其失衡之处，都是这个世界从未有过的。因此，分析两国经济以及关注两国双边关系的独特之处是十分重要的。

美国国内私人需求自金融危机以来便大幅缩减，随着财政刺激政策连续出击，以及银行紧急救市政策的出台，稍许弥补了经济的冷却。美国将面临的财政危机很容易推测，但由于美国普通民众在金融危机浪潮中拼命固守他们的福利政策，同时华盛顿的党派分裂使得美国的政治体系处于近乎难以管制的状态，因此仍难以明确这个国家是否具有面对这些挑战的政治意愿。美国是否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将对其世界经济地位——其贸易差额、对外借贷以及美元的坚挺——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不遗余力地将其经济重心放在国内经济上——尤其是通过庞大的财政刺激政策以及银行借贷刺激其经济，使中国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尽管中国的银行在金融危机时期依旧坚挺，但中国政府掀起了一股国有银行借贷狂潮，仅 2009 年首季度的新增贷款便超过了未来 3 年所有财政刺激计划总和，甚至多于 2008 年银行贷款总额，虽然那已是中國历史上最大的贷款量（Leow，2009）。

近年来，中国国内消费水平也快速增长，但仍赶不上投资水平。目前，中国的投资量占 GDP 的 45%——从全球标准看，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投资比以往更倾向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有企业。

中国政府不断表示希望调整国内经济结构，使其从投资型向消费型转变。然而，中国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应对却表明，其政府总是期望投资能使其经济充满活力，以保持增长态势和充分就业。用以提升中国普通民众消费水平的各种各样的改革——包括一个更开放、更有效的零售金融体系，和为病人以及老年人提供支持的更有力的国家福利体系——似乎仍遥不可及。中国能否成功完成从依赖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到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接力，将对其在未来数十年内的世界经济地位产生重要影响。

四 私营成分的相互依赖性

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各自的问题不仅将影响两国关系，也将影响它们与世界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中美经济失衡的独特之处在于那与两国总体经济

轨迹同样突出重要的部分，其中贸易数据尤其令人烦恼。美国已经有能力大幅缩减其对世界其他各国的贸易逆差，但这并不包括中国。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持续保持小额贸易逆差状态，但其对美国大量贸易顺差的增长之势似乎没有上限。

为何中美关系如此特殊？传统观念将其归咎于中国——尤其是中国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的调控——对美国的不公平竞争，并因而抢夺了美国人的工作。这样的观点在金融危机前的美国中部很常见，在其失业率持续保持两位数水平之后变得更加流行。

在过去 10 年中，美国在制造就业机会上投入了 400 亿美元，同期，美中贸易逆差大幅增长，并成为新闻头条。因而很容易在两者之间寻找因果关系。以下是美国参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描绘的 2009 年 3 月时他所认为的美国中部地区的图景：

俄亥俄州的制造商保障员工的最低工资标准，这里有洁净的空气、干净的工作地、完善的产品安全规定，这都有助于保持员工身体健康、拥有较高生产力，并且保证客户的安全。中国的制造商并没有最低工资标准，同时，污染当地水源、允许员工使用危险而有缺陷的机械是常事。俄亥俄州的制造商缴纳税收、健康保险、社会保险，员工享有探亲假，而当一个工厂即将倒闭时，他也会提前给予倒闭通知。中国的制造商常常雇用童工。俄亥俄州的制造商没有政府补贴，而中国制造商常获得开发新技术或出口援助政府补贴。中国制造商从政府对其货币的操纵中获利，为此他获得了 40% 的成本优势^①。

当然，就中国对于外资进入其国内市场的限制以及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犯而言，关于中国“不公平竞争”的批评是有些道理的。但固定而偏低的人民币汇率并不是中美经济失衡的全部。

从 2005 年起，根据《经济学人》^② 指出，由于在流通领域中国的通货

① < http://brown.senate.gov/newsroom/press_releases/release/?id=83a8362f-5b7f-4901-9659-37957ac77798 >

② 《名义上便宜了还是实际上贵了？》，《经济学人》2010-11-04。

膨胀水平比美国更高，因此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升值超过 25%，而实际汇率则上升了 50% 左右（见图 14）。为缓解 21 世纪上半叶中美两国之间不断扩大的经济失衡，2005 年中至 2008 年中，中国政府允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步升值。深陷于金融危机的混乱与广泛不确定性中，中国政府决定重新定位人民币对美元的价值。然而当中国政府确信金融危机最严重的影响已经过去，人民币对美元再次逐渐升值，目前已升值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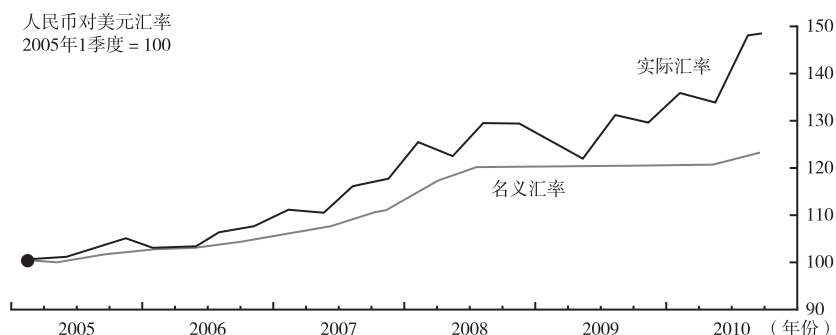


图 14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2005 ~ 2010）

资料来源：The Economist；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CEIC；Thomson Reuters

尽管人民币强势升值，但中美贸易失衡仍不断扩大。这个事实表明，在中美贸易关系中，汇率操纵并不是全部，甚至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那么，隐藏在不断扩大的贸易失衡背后的是什么？有一个答案是中美两国商人都相信但甚少公开表示的，即总体贸易数据被严重误导且低估了美国的获利情况——此处有两个原因。

首先，中国出口的大部分都与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相关。根据近期的一则对 2005 年数据的系统研究显示，跨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提供一半的中国出口商品，跨国公司（MNCs）与中国企业合作的中外合资企业则提供中国出口商品总量的 25%（Manova, 2011）。换言之，中国出口的商品只有 1/4 是真正的“国货”。

其次，许多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参与全球供应链，把在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制造好的配件在中国装配成最终产品。如在 2010 年，中国对日本和韩国的贸易逆差远超 500 亿美元，对台湾的贸易逆差甚至更大——这三个地区都是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商，这些产品最终将在中国完成

装配并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中美商会，2011）。

外国公司认为产品是“中国装配”，而中国人却认为产品是“中国制造”，这样的情形在苹果公司的 iPhone 手机上体现得最为清晰。2009 年，官方贸易数据显示，1100 万部 iPhone 手机由中国运送至美国，这些 iPhone 的总价值略高于 20 亿美元，而其中仅有价值 1 亿美元的零部件是在美国制造的。因此这些 iPhone 为美中贸易逆差官方数字增加了 19 亿美元。

普遍认为，iPhone 的部分零配件在其他地方制造，而它的所有利润却流向了苹果总部、硅谷以及其大多数美国股东。然而，一项由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人员主持的新研究发现了每一部 iPhone 背后写的“加利福尼亚设计，中国装配”显示的经济事实（Xing 和 Detert，2010）。根据这项研究，德国、日本、韩国制造的组件占了 iPhone 那 200 美元售价的 2/3，而中国完成一部 iPhone 的组装——由一家在大陆经营的台湾公司富士康负责——仅值 6 美元，低于美国组件运送到中国装配的运送成本的一半（见图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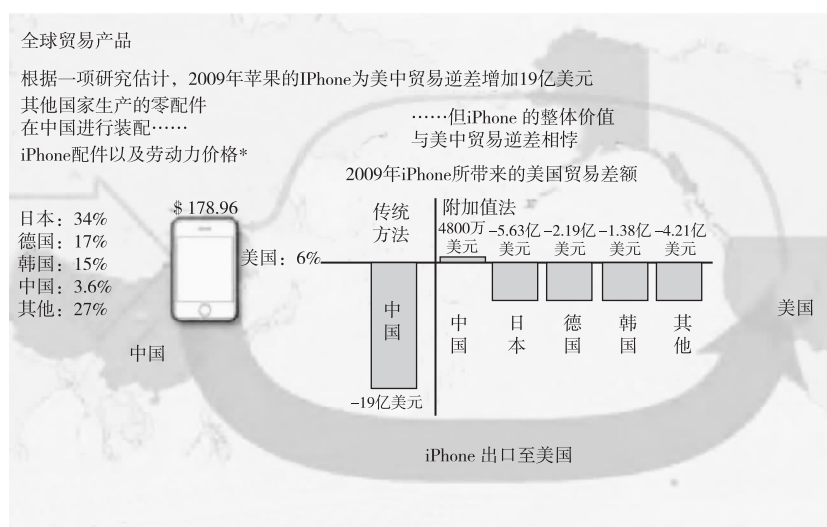


图 15 iPhone 供销链

* 估计数据，由于取整并非 100% 精确

资料来源：Y. Xing, N. Detert. 2010. iPhone 如何扩大美中贸易逆差 ADBI 工作文件 257. 东京，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

因此，这些 iPhone 从美国运到中国产生的实际净出口额仅为 5000 万美元，而不是贸易数据上显示的 20 亿美元的逆差额。德国、日本和韩国是中国的净出口国。苹果公司从 iPhone 的零售销售额上赚取的利润高达 50%，这也推动了它在纳斯达克指数上的出色表现，但以上这些并没有计算在那高额利润中。

美国人应该为 iPhone 庆祝，不仅由于个人从 iPhone 上获得的价值，更因为美国经济通过“苹果”动力而创造的价值。如果美国人想抱怨 iPhone 全球化带来的危害，他们应该更担心为什么磁盘驱动器、存储卡和显示屏来自德国、日本和韩国而不是美国。从最重要的经济意义上来说，iPhone 在中国装配而成的事实仅是故事的一小部分——尽管这只是从美中贸易数据中挑选的一个信息。

对于美中贸易失衡的常见评论，首先有两方面回应，一是近年来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二是如苹果这样的跨国公司是中国发挥装配平台职能的主要受惠方。对于贸易失衡传统评论的最终反驳是美国的跨国公司从中国崛起中获得了巨大好处，不仅仅将中国作为出口平台，并且在中国生产、直接进入中国市场销售。

通用汽车公司便是可效仿对象。历史悠久的通用汽车——20 世纪美国制造业的标志——被奥巴马政府从金融危机的暗无天日中挽救出来。目前，它已重新赢利并开始归还政府救助资金。然而，底特律和华盛顿的亲密无间并非通用汽车复苏的真实原因：其与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上汽集团）合作成立的合资企业在中国制造并销售汽车和卡车。

当 2003 年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在浦东销售首批汽车时，它的销量为 20 万辆。同年，通用汽车在美国的销售量大约是 500 万辆（图 16）。随后 7 年内，通用汽车在美国的销量大幅下降，但它在中国的销量却直线上升。2010 年，通用在中国的销售量——250 万辆——超越美国。同时，据多数人估算，考虑到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更加新型的生产设备，以及中国拥有足够大的中上层阶级市场来承担全球汽车价格，通用在中国的生产规模比美国的大。

当然，通用汽车在中国可做的有限。在其中国业务中，通用不可能持有大部分股份；通用公司明白，在中国制造汽车也意味着中国本土公司将学习它的技术；同时，通用也了解中国政府希望能建立自己的全球一流的汽车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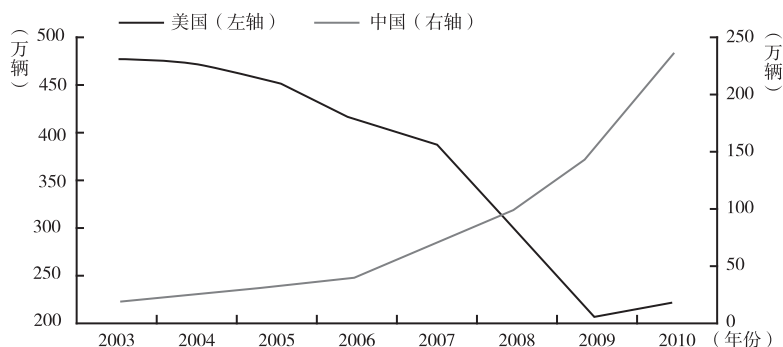


图 16 通用汽车销售量 (2003 ~ 2010)

资料来源：通用汽车公司。

造品牌。然而，就中国市场的规模以及未来增长而言，通用汽车在中国仍是不可阻挡的，并将保持其势头直到中国本土企业的出现。

相比于官方贸易数据，苹果以及通用汽车的例子更接近中美经济关系的实质。但不论是这两家企业还是美国政府都不愿意透露其中奥妙——因为这在美民众中只会引来“工作在哪里”的质问。中国政府更愿意将全球经济的新现实告诉美国人，然而将美国企业在中国土地上大获成功的事实公之于众似乎并不能说服中国民众，这是政府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寻求的发展之计——而不是为了推动本土创新。

的确，想在中国经商的美国企业面临重重困难——最主要的便是市场准入限制以及对知识产权较弱的执行力度。中国政府期望创建数百个世界一流企业，因此其产业政策在消费支出上越来越倾向于本土企业而非外国企业。在诸如银行、证券、电信、法律服务以及保险等主要产业领域，外国公司几乎全部或部分被拒之门外（Ahrens, 2010）。

然而，美国的跨国公司明白，由于中国的消费中产阶级快速增长以及其极具成本竞争力的生产流程，它们不可能生活在中国的影响之外。它们正在尝试如何能更便利地在中国经商，并且不将东道国逼得太紧（中美商会，2010）。

美国政府正伺机而动，目前，其对中国的高层次经济外交不仅关注如何提高跨国公司的市场准入率，同时也为受中美经济失衡不利影响的美民众在美国进行诉讼。

五 处理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经济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更关乎两国国内经济，而非其经济关系。由于中美两国皆已从应对危机阶段转向了复苏阶段，因此在 2009 年 7 月两国举行首次战略经济对话时，希拉里·克林顿和蒂姆·盖特纳会见了中国代表。而在此次会晤前夕，两人已明确表示国内经济是两国最大的经济挑战：

随着我们渐渐恢复，我们必须采取额外的步骤为今后几年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这对美国而言，将包括重建储蓄、加固金融体系，以及加大在能源、教育、医疗保险上的投入，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高产、更繁荣。对于中国，这意味着金融体系的持续改革与发展，也包括刺激国内需求增长以减少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提升个人收入、加强社会安全网这些措施既能回答为何中国人觉得有必要存储，还能对中国内需以及世界经济提供强有力的刺激（Clinton 和 Geithner, 2009）。

然而，总结克林顿和盖特纳提出的挑战，无外乎是改变两国经济的 DNA。未来可预见，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国内经济挑战将是奥巴马总统所说的“财政可持续性”。美国国债受奥巴马政府抵御金融危机政策的巨大影响，仅稳定国债便需要削减税收，或增加中央政府近 1/3 的花销，抑或增加美国 7%~9% 的 GDP 支出（Auerbach 和 Gale, 2009）。

奥巴马总统的 2011 财政计划预计到 2020 年财政赤字约为 GDP 的 5%——增加国债发行量，在 10 年内从 GDP 的 50% 左右上升至 90%。他提出的最重要财政改革便是终止布什对于美国富人削减税收的政策——其本质上不足以扭转财政不可持续性的曲线。国会中新得势的共和党人已经有一个计划，基于大量削减支出，能够基本平衡预算而不需要终止削减税收。但他们发现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意接受共和党这样为平衡预算而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事实上对于老年人医疗保险的私有化。对美国而言，阻力最小的途径便是保持美国财政计划的大量赤字，这在美元的跌势中最能得到反映。

中国的挑战是美国危机的镜像。不似挥霍无度的美国人，中国人存钱以

备不时之需。紧密结合的大家庭是因为，当他们生病、老去或失业时，照顾他们的是家庭而不是政府。即便中国人想花钱或是借款，消费者社会需要的零售金融服务在中国充其量只是雏形。

中国政府有能力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网以及改变监管环境使其有利于针对顾客的零售银行业、信用卡业以及保险业的发展。但是政府却更喜欢对基础设施、国有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进行投资，并将国有银行作为首选中介。

这一战略对中国政治及经济都有所帮助。由于始终关注生产力的推动，中国政府能够履行它的隐性承诺，即充分就业以及提高所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民主贯穿了中国巨大的消费主义中产阶级发展过程，而中国政府对于这种民主的历史也同样了解。中国的领导人从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改革”中学到了许多，他们不会轻易重蹈苏联天真的开放之路。

考虑到从根本上重组中美两国经济的困难之处，将经济失衡归咎于另一方、并作为自身经济面临挑战的原因，对于两方而言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当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后引发的首轮恐慌有所缓解，两国对于金融危机直接后果的反应似乎便是如此。

2009年上半年中美两国之间的公开争端逐渐增多，此后以美国为首，中国紧随其后，不断这样的情况已不令人惊奇。

美国方面，2009年初期，盖特纳在他的提名听证会中透露称，中国确实“操纵”其货币汇率。奥巴马总统明白这将引起一套需要美国对中国进行“报复”的法律程序，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他称财政部长说错了。

中国对于盖特纳的外交“失礼”反应迅速并激烈。总理温家宝非常担心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他说，鉴于这次金融危机，“我们当然有理由担心我们资产的安全”。一周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新全球储备货币，“它与个别国家无关，并能保持长期稳定，因此能够消除由使用以信用为基础的国家货币所引起的固有缺陷”（Anderlini，2009）。他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指出美元，但我们都很清楚他忧虑的重点。

由于双方都明白这是在玩火，因此对于美元疲软以及人民币操纵风波的公开争端很快平息。然而，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争论很快便代替了对于货币的相互嘲弄。

仅因为中国进口产品给美国产品以及就业机会带了不利影响，便利用美

国贸易法第 421 节以及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协议上的模糊之处来提高中国产品进入美国的关税。这是乔治·W. 布什不愿意做的事，而当奥巴马决定这么做的时候，美国便打响了这场论战的第一枪。在这个案例中，产品是轮胎，而关税高达 35%，推动这项法案的游说集团来自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个法案所设定的先例。中国和世界都拭目以待，奥巴马是否能抵御贸易保护主义的诱惑并且收回竞选时提到的确实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言辞。在轮胎案中，奥巴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无疑为纺织和钢铁生产商考虑向奥巴马提起类似的诉讼壮胆。

中国的反击非常迅速。中国政府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声明指出美国向中国市场倾销鸡肉和汽车配件——将目标对准美国经济中的两个组成成分，这两个行业在金融危机时接受美国政府津贴补助。一个月后，他们将尼龙也列入潜在倾销产品名单。

但在 2009 年这些有关货币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小摩擦中最有趣的是，它们并没有失控，并没有如许多人预计的那般发展成贸易战或货币战。相反，回首那些落后封闭的年代，中美两国冷静人士也推行柔和的经济外交，这成为了金融危机前数十年的特色。

中国期望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保持真诚的交流，但这其中又不失夸大成分。同时，中国也希望能维护其在东亚的利益。随着中国成功摆脱了金融危机，而美国仍处于纸上谈兵的困惑中，中国对这两个期望的实现越来越有信心。因而在 2010 年，中美竞技的舞台已从经济转移到了地缘政治的领域。美国对此的回应是在西太平洋进行越来越多的军事演习，以及强调其与许多在这个地区的以市场经济主导的民主政体共享的价值与利益——不仅仅与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还包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但不包括中国。

此外，有预言称中美两国的地缘政治上的紧张将全面爆发，但没有证据显示如此——一如他们此前的情形。

放眼未来，似乎有理由期望中美经济摩擦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从贸易领域转移至两国之间的投资问题上。

金融危机前，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其半国营企业希望收购美国的企业。然而美国的反应十分激烈——这在 2005 年夏天的国会风暴中表现得最为鲜明，以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不得不撤销其对一家小型美国石油和天然

气公司（Unocal）的竞价。从那时起，中国便在美国的公司控制权市场中保持低调，并在如百仕通（Blackstone）公司这样的影子银行对制造企业的明显收购，以及对于典型美国中产阶级就业机会的获取中选择较少股权。

由于人民币似乎将继续对美元升值，因此继续对外直接投资并在美国掀起采购浪潮对中国的经济诱惑非常大。结合金融危机对于美国资产价格的连续打击，以及对美国国债的影响，中国对其持有的美国国债的安全十分担心。但很难想象美国的反应将是友好的。

在中国，政府对其市场的严密监管给希望在中国立足的美国企业带来许多障碍——如果外资对中国政府所谓的“国家经济安全”有威胁，中国政府有能力抑制这些潜在外资，这样的能力也增加了不少阻碍。美国企业对能够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需求的预期垂涎不已，并且他们愿意竭尽全力深入中国市场。沃尔玛目前是中国最大的零售商，但是这家以反对建立劳工组织闻名的企业，不仅不愿意其中国员工建立工会，也不愿意他们在沃尔玛召开共产党有关会议；通用汽车是中国最大汽车制造商，但它的合资企业仍被其中国合作伙伴（上汽集团）所控制；美国银行仍为其在中国设立分行孜孜不倦地努力，但也已证明即使是想获取少量股权也是不可能的。

中美两国之间地缘政治竞争也注定将在未来激化。然而好消息是，可能引起中美军事对峙的潜在触发点明显正在减少。台湾地区与中国经济的一体化有助于继续建立台湾地区与大陆之间更紧密的联系。日本和中国或许会在争议岛屿上有所交锋，然而人人都知道日本未来经济与日本密切相关。近年来，超乎多数人的预期，中美就遏止朝鲜核野心问题上合作密切。西藏似乎无法取代台湾的重要地位。在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的问题上，包括争论不休的制裁伊朗问题，中国或许并不总会与美国合作。但这关乎外交上的合作，而非白热化的军事竞争。

六 结论

中美关系中似乎存在两条底线。一方面，两国之间的摩擦不可避免。中国迅速崛起；美国日渐衰退，即使这速度比通常估计地慢许多。两国在价值观与利益上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差异，而两国的经济失衡又非常巨大，并且似乎将长期存在。中国国防开支的增长比其震惊世界的经济涨势还要迅猛，这

让美国鹰派对中国仅用于自卫的军事目的保持怀疑。

另一方面，两国一次次地成功缓解了两国关系中或将失控的紧张局势——任何时候，这都比重蹈金融危机覆辙更好。两国似乎达成共识，相互吐露两国的真正难题是双方合作经商的必要条件，而这些真正的难题通常都着眼于国内民众。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解释两国之间不可避免的频繁冲突更像释放压力的阀门，而不是发展成森林大火的局部小火灾。

双方都认同，两国经济关系的利益是巨大的。对美国而言，中国不仅仅是美国创新的廉价装配工，它也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中产阶级消费市场。而对中国，美国不但是作为其杀手锏的最终消费者，而且它还是科技和知识的储藏室。即使中国的繁荣削弱了其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些科技与知识也能帮助中国保持其经济的生产力和效率。双方也了解，一旦两国真正产生冲突并最终发展成战争，代价将是毁灭性的。

中美两国之间这种高度务实的态度有赖于双方领导人。近年来，两国均历经了多代领导人的执政，目前两国已能应对这项挑战。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带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的风险，并增加了中美之间的潜在摩擦点。然而，经济一体化以及规避军事冲突带来的巨大成本将对两国的利益带来更多的好处，因而两国的冷静人士将对此密切关注。

参考文献

Ahrens, N. (2010), *Innovation and the Visible Hand*, Jul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2011), *2011 American Business in China White Paper*,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Beijing.

Anderlini, J. (2009), "China calls for new reserve currency", *Financial Times*, 23 March.

Auerbach, A. and Gale, W. (2009),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Fiscal Crisis: 2009 and beyond*, 19 February,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Clinton, H. and Geithner, T. (2009), "A new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with China", *Wall Street Journal*, 27 July.

Ferguson, N. (2009), "What 'Chimerica' hath wrought", *The American Interest*, January-Februar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09), *The State of Public Finances*, Jul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1), *World Economic Outlook*, Januar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Kissinger, H. (2011), “Avoiding a US-China cold war”, *Washington Post*, 14 January.

Leow, J. (2009), “Fitch sounds alarm on Chinese lenders”, *Wall Street Journal*, 22 May.

Manova, K. (2011), Firm exports and multinational activity under credit constraints, Ms.,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2011), *US-China Trade Statistics and China's World Trade Statistics*,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Washington, DC, and Beijing, < <http://www.uschina.org/statistics/tradetable.html> > .

Wolf, M. (2008), “How imbalances led to credit crunch and inflation”, *Financial Times*, 17 June.

Xing, Y. and Detert, N. (2010), *How the iPhone Widens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Deficit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Tokyo.

(范欣怡 译)